

唐宋内丹道教

张广保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道

家

文

化

研

究

丛

书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主编 汤一介 陈鼓应

唐宋内丹
道教

张广保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内丹道教/张广保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1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80646-229-5

I.唐… II.张… III.①道教,内丹道-研究-唐代②道教,内丹道-研究-宋代 IV.B95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406 号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官超

唐宋内丹道教

张广保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3 字数 291,000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ISBN 7-80646-229-5/B·46

定价:24.00元



作者张广保 ▶

自占一首述内丹道教之宗旨

乾坤圈内起乾坤
 壶天境中辟壶天
 太一初分何处寻
 空留历数变人心
 顺则为人逆成真
 返者道动伏去机
 道琴惟向知音奏
 千载而下待解人

▲ 作者张广保手迹

唐宋内丹
 道教
 家文
 化
 研
 究
 丛
 书

道家文化研究丛书 总 序

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一样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哲学家雅斯伯思(Karl Jaspers, 1883—1969)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这些文化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传统,而且这些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只是在后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才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影响。这说明老子开创的道家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本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内外对儒家学说的研究比较兴盛,相比之下道家思想的研究不像儒家思想的研究那么红火。但进入九十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对道家思想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在国内不仅出版了不定期的丛刊《道家文化研究》,而且召开过多次国际性的“道家文化”的学术讨论会,还出版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专著,推动了道家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总观历史,我们可以说,儒道两家在思想上形成的某种互补格局(当然后来又有佛教的加入,形成了儒、道、释三家在中国历史上合流互动的局面),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说儒家思想的特点表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那么道家思想的特点则表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儒家大体上是从追求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而发展为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即人类社会的和谐),例如儒家所提倡的“和为贵”、“致中和”等思想就表现了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的追求。道家则是从体认自然的和谐引申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和庄子所说的“太和万物”的思想,都表现了道家“崇尚自然”的特质。因此,对道家思想和对儒家思想的深入研究都是我们应特别重视的。从目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重大课题看,大家都承认是“和平与发展”问题。人类社会要合理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和平共处”,因此就要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要调整好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儒家思想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资源。但今日之世界不仅需要较好的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较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人类社会才可以“共同发展”,在这方面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无疑可以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因此,推动道家思想的研究是很有现实的和理论的意义。至于道家思想在哲学形而上理论层面的贡献,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而且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研究道家哲学理论需要以现代眼光给以新的诠释,使之日日新,贡献于世界。

道教是中国本民族的宗教,它和道家(老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说道教在思想文化上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继承和发挥。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不仅对民间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它对中国哲学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等)都有重要影响。查《道藏》中收入了对《道德真经》(《老子》)的注释五十余种,对《南华真经》(《庄子》)的注释十余种,这些注释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老庄思想的发挥。如果我们说,先秦老庄是道家思想的第一期,即创始期;那么魏晋时期的“玄学”则可以被视为道家思想的第二期发展,例如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都是对老庄思想的新的解释,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唐初兴起的“重玄学”,我们可以把它视为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发展。道家思想的第三期重玄学是继承了魏晋玄学的思想、并吸取了印度佛教发展起来的,而它的建立则是通过对《老子》、《庄子》的注释实现的。唐初重玄学与魏晋玄学相比,它把道家本体论发展为道家心性论,而重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成玄英和李荣都是道教徒,而且以后大多数通过注释《老子》、《庄子》来发挥其思想的大都也是道教徒。这就是说,到隋唐以后,从哲学理论上,前此的道家思想是由其后的道教接着向前推进的。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它必有一超越的终极目标以及如何通过修持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重玄学虽然为此目标建立了以“理”、“性”、“心”、“气”的心性学架构,但它还没有提出一套为实现此目标的修持方法,其后有“内丹心性学”的出现。“内丹心性学”虽是唐末以后一直到宋明道教思想发展的特有形式,但从理论上,它仍然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发展。就这个意义上说,道教的思想理论是和

道家的思想理论分不开的。我们编辑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就是基于这种考虑,把道家 and 道教联系在一起,都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要求以专著的形式撰写,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撰写和出版能提高道家 and 道教的研究水平。为此,我们组织了全国各地对道家 and 道教有较高研究水平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作为这套书的作者,计划在三至五年内出版四十本有关道家 and 道教的专著,每年出版若干本。这四十本书大体分为四组:道家发展史专题研究,是按照历史时期对道家作思想史的研究;道家思想专题研究,是对道家思想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的研究;道教思想专题研究,是对道教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的研究;道家、道教著作专题研究,选择对道家 and 道教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典籍进行研究。虽然这四十本书每本都是单独的专著,但是把这四十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看,则又可以看到道家 and 道教的方方面面。

这套“道家文化研究丛书”是由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书院主持编写的,它能够出版,是得到了台湾凯胜集团董事长黄胜得先生的资助,又得到了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汤一介

1999年7月8日

序

研究道教史有种种困难，我在王宗昱同志《〈道教义枢〉研究》的“序”中说到了几点，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没有说到，这就是有关道教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除《道藏》外，散见于笔记小说、地方志、碑铭等等之中的也非常多，它们不仅可补《道藏》之不足，尚可纠正《道藏》中有关史实和论述的许多错误。张广保同志的《唐宋内丹道教》不仅大量地利用了《道藏》中的有关材料，而且利用笔记小说、方志、碑铭达百余种之多，可见其用功之勤。

张广保同志的《唐宋内丹道教》可以说是他继《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论研究》之后又一力作。如果说后者为我国“内丹心性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前者则在梳理“内丹学”发展的历史上大有功焉！

一部成功的历史书籍的学术著作，首先应尽可能地掌握有关材料，并科学地利用和阐释材料。张广保同志这部《唐宋内丹道教》可以说做到材料详尽，取舍得宜，考证精慎，立论坚实。我过去也注意过苏元朗与“内丹”的关系，但并没有下功夫去搜寻有关资料，广保除了对《罗浮山志》作了合理的分析，且利用了《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題》、《宋史·艺文志》、《通史》等的有关材料，说明苏元朗确与“内丹”有关，同

时他又说明由于史料的缺乏对苏元朗内丹道教的细节已无法了解(见该书第9页),这种利用材料的扎实学风应该提倡。又如在讨论钟离权、吕洞宾的生平与著作,除广泛利用《道藏》中有关材料,还利用了敦煌文献、佛教著作以及笔记小说等,使我们对钟、吕的生平与著作有了较为可信的了解。特别是利用《能改斋漫录》以证吕洞宾与苦竹真人之关系,考证《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中所引之《破迷歌》不是钟离权的《破迷正道歌》,而是唐太白真人所撰等等,均见张广保同志在掌握材料上之功力和取料、论断之审慎,立论之坚实也。

一部学术著作贵在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所创新,使之向纵深发展。张广保这部书可以说“新意迭出,再开风气”。由于道教材料杂乱和其论说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得出可信的新的论断颇为困难。而张广保的《唐宋内丹道教》不仅能在杂乱之材料、论说存在的种种矛盾中清晰勾画出由唐至宋内丹道教发展的历史,而且提出颇有系统的创见,为道教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局面。该书提出道教与其他许多宗教不同在于“以术证道”(第32页);钟、吕内丹道的理论基础除了“天人同构”(第177—178页)、“人体小宇宙”(第178页)外,还在于他们“以阴阳生成之道作为证道超越的理论基础”(第181页),以及对张伯端的《悟真篇》的分析并揭示其内在矛盾和如何解决之思考等等,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又如,张广保认为,钟、吕内丹道是内丹道教的成熟形态,并指出它有三个特点:以内丹道参证天道;使内丹学系统化;在对传统道教内修批评的基础上而与之严格分开。这一看法也许给人们提供一对“内丹学”的新视角。我们大概可以说正是钟、吕才开启了真正的内丹道教。我有个看法,如果说成

玄英等“重玄学”为“内丹心性论”提供了一个“心性学”的理论基础,而钟、吕以后才把“心性论”与“内丹学”真正结合起来,成为“内丹道教”。我特别想提出的是张广保同志对内丹道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方法上的创见应受到学界重视。他说:“张伯端内丹道在修性与修命问题上的矛盾,其实正是传统道教在看待生命问题、超脱境界等有关问题思想混乱的一种表现。道教看待人的生命,习惯将其分为形体与精神两个层次。一方面,他们主张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而使形体归融于精神,最终通过以神合道,而契入终极超越本体。另一方面,他们又受中国文化传统的重生观念的制约,强调人之有生,皆因其有形,因此仙道贵形,道教内修应神形俱全。这样他们在论述终极的超脱境界时总是脱离不了形体的拖累。道教生命观的这一内在矛盾,曾经将许多道门宗匠的思想拖入困境。”(第336页)又说:“按道教在看待生命问题、解脱问题时显露的这一矛盾,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同时执持两种生命观,一种为世俗的生命观,另外一种为宗教的生命观。……以上两种不同的生命观导致了道教两种超越观,使得道教思想家在论及超越问题时,常常互相矛盾,前后冲突。当然,后世道教思想家尤其是内丹道教思想家尝试打通形、气、神、道之间的障碍,使其通贯一体来解决两种对立的生命观之间的矛盾。……这一解决方法为宋以后之内丹道各派所普遍采用,可以看作道教思想家架设在上述两种生命观之间的一座桥梁。”(第339—340页)任何宗教理论甚至任何哲学学说都会存在某种内在矛盾,因而这就需要一代一代的宗教学家和哲学家不断地去解决其思想体系中存在的矛盾,这样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才能不断创新。关于道教思想本身可能存在的矛

盾,大概应是道教思想研究者不断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吧!

张广保同志在写了《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论研究》之后又写了《唐宋内丹道教》,我希望他再接再厉,写出一本唐朝以前的道教史,这样可以构成一部完整的道教史了。

汤一介

2000年10月4日

自序

作为渊源于中国本土的一种主要宗教形式,道教与世界上其他各大宗教和基督教、佛教及伊斯兰教相比,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特征,这就是:以术合道或称术道合一。道教在展开其终极而超越的根本大道时,除了采用直截了当的铺陈方式外,更注重通过各种方术形式来彰显它的玄冥恍惚、窅然难测的道。此类方术在道教中甚多,主要有符箓术、咒术、斋醮术、外丹术、内丹术、行气术、导引术等等,甚至传统中医也被纳入道教中,作为一种补充性的修炼术。《正统道藏》即收录《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晋代有名的道士葛洪则将药分为三品,上药服之使人超升,下药则惟有祛病健体之效。对于道教在一千七百多年的发展中构筑出的这些方术门类,我们不能简单将其看成是一种拼凑,因为它们都是道士体道、证道的不同宗教实践形式,是围绕着根本的大道而展开的。这其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重实用、重证验、不尚虚华空论的思维特性,与中国哲学思维的一般特征是相适应的。对此,我曾戏称道教的以术合道乃是“上天有路”,因为它并不局限于从理论上谈超越,而且更注重探讨各种具体的超越之路。至于这些道路是否真正能把人们带入根本的超越界,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任何一种宗教也无法保证。

内丹术(或称内丹学)作为一种重要的道教方术,在道教以术证道的求道实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构成《正统

道藏》三洞四辅十二类的文献中,方法类、众术类、玉诀类基本上都是由内丹术或与内丹术有着紧密联系的经典组成。其他各大类如本文、记传等也与内丹术有着种种联系。按最保守的估计,在《道藏》文献中与内丹学有关的文献不会少于百分之三十。除此之外,道教由肉体入手探索生命超越的根本宗旨在内丹学中也得到完满的体现。内丹术就是探讨如何从人的生命形体层面进入精神层面,最终通过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以逆向回归的方式来契证原初的大道。

谈到内丹术的根本学理,我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这涉及到东西方两大世界传统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事实上,人们在观察和描述外在世界时,总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观察的角度不同,则获得的视域自然会有分别。传统西方世界习惯采用点、线、面的观察方法,注重由个别现象的观察引申出一般的结论。这种方法长于对单个现象的观察,然而却容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遗漏事物的真正本质。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人们则往往直接从整体切入,偏爱从整体的角度把握部分。其缺点是由于缺少对部分的细致观察,因而对整体的描述显得模糊。东西方传统思维的这种分别在中医与西医中表现较为充分。

作为内丹术根本奠基的学理——人体小宇宙理论,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代观照外在世界的独特视域。内丹术的基本概念是精、气、神,基础理论是人体小宇宙这种天人合一、天人同构的思维法则。这两条与传统中医理论都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中医采用顺的原则,主张顺应自然,使人体与天、地自然系统达致最大的和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祛病延年。而内丹术则倡导“顺则成人,逆成仙”,主张逆反人的自然生命程

序,通过炼精化气,精气化神,炼神返虚这种所谓三关修炼,最终达到体道、证道的终极目的。不难看出,与中医相比它走的完全是一条逆反的道路。这种顺、逆的区别,完全是由二者的根本目标决定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与宗教两种实践形式的分别。然而,无论是中医还是内丹学都与西方医学的思维有着重大的差别,像精、气、神这类内丹术和中医的基本概念,西医是不认可的;即使是对于经络、穴位,由于目前尚未发现解剖学方面的证据,西医一般也将其视为一种虚构。这显然是有欠公允。因此,我们对内丹术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批评时,绝对不能站在传统西方思维(多数人将其与科学思维划等号)的基础,而应从古代中国思维内部出发,对其得失进行检讨。

其实,当代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也已开始突破古代西方世界的那种机械、狭隘的思维模式,而趋近于与古代东方思维视域的交融。随着近年来克隆技术的出现,克隆羊多利的问世,我们对中国古代尤其是构成中医及内丹术根本理论的人体小宇宙思维应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克隆技术的学理不外通过个体细胞的无性繁殖来造就新的个体,这意味着个体任何部分的单个细胞都隐藏着整体的全部遗传密码。这种现象若以西方传统的以整体与部分思维为特征的心身观显然难以解释,因为部分既然构成整体,那么它必定小于整体。而中医、内丹术的人体小宇宙理论认为,从宇宙观方面看,人体是整体宇宙的缩影,包藏着宇宙的全部信息;从人体方面看,如果将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那么构成其基本单元的每个部分都包含着整个人体的全部信息。不仅如此,中医还创造性地发明耳针、手针,将这一理论实践化。手针、耳针都

是建立在全息思维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的手、耳对应整个人体。(内丹术的全部修炼程序也是按这一思维设置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基础理论的合理性并不能证明结果的有效性。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简单将其斥为反科学的迷信,而应对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予以认真对待。

最后,我们可以说内丹道教不仅在道教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唐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只要翻一翻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的小说笔记,便可一目了然。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关于内丹修炼的描述比比皆是,如《西游记》、《封神演义》对于仙、妖、人三界修炼的叙述,《金瓶梅》关于房中术的言论,《聊斋志异》有关狐仙炼内丹的故事等等,不胜枚举。对于这些文字,如果我们不具备一些道教内丹术方面的知识,那就很难真正读懂。由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内丹术在唐以后已开始走出道教,对古代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现实生活发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考虑内丹思想对唐以后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那么我们对古代社会的复原就是不完全的。

正是由于上述理由,近年来国际、国内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内丹道教的研究,以国外为例,单就作者所知,美国、法国、日本均有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Lowell Skar 即以内丹道教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然而,作为一种有着千年以上历史发展的道教方术流派,内丹学及其学派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演变脉络。从历史渊源来看,内丹术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养生方术,例如行气术、导引术、存思术,因此从广义的内丹术概念来看,它的历史甚至远早于道教本身。此外,研究内丹道教还必须区分内丹道教、内丹、

内丹术,内修方术等概念,因为它们指称的对象是不同的。至于内丹道教各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像八仙中的钟离权、吕洞宾、韩湘子),他们的历史活动更是扑朔迷离,由于长期以来民众对他们的神格化,使得他们大都具有一种半人半仙的形象。这些都需要我们以《道藏》文献为基础,结合藏外尤其是史部、说部、方志及金石碑铭材料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订、鉴别,以复原其真实的历史面貌。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就是想对这一主题作一尝试。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及作者的学力、才识的限制,错误疏漏之处肯定不少,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张广保

2000年8月28日